

# 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怎样落实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若干问题

汪海波

**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笔者长期在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研究中所做的探索,以《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2015)》的撰写为例,就中国经济史研究怎样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问题谈了几点体会。即必须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其任务是要通过史实的研究和叙述,揭示生产关系(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和作为其实现形式或经济运行机制的经济体制)和生产力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必须遵循反映辩证唯物论要求的实事求是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反映历史唯物论要求的生产力标准;必须从质和量两方面研究和叙述经济变革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固有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必须进行创新。

**关键词:** 中国经济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 指导思想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全面系统深刻论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指导地位这个根本问题。他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他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战略高度,依据对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对这一点做了分析。“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他还为实现这一点指明了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样用上来”。<sup>①</sup>

据此,本文拟结合笔者长期在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研究中所做的探索,以《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2015)》<sup>②</sup>的撰写为例,就中国经济史研究怎样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问题,谈几点体会,以就教于经济史学界同仁。

**第一,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要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讲话》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

[作者简介] 汪海波,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兼职教授,北京,100732。

①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2016年5月18日。以下引证的《讲话》,均出自该处,不一一注明。

②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主编并参与撰写了一卷本《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84)》,后来又主编并参与撰写了四卷本《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2000)》,近年来又作为主要作者撰写了一卷本《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2015)》。前两部均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最后一部正在出版过程中。

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成果,指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十分重视党在中国经济变革和发展中的核心领导作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由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现也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付诸实践的。从这种相互联系的意义上说,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中国经济变革和发展的实际过程来看,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新中国建立后生产建设的成就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被国际舆论普遍誉为世界奇迹。其实,这个奇迹最重要的“谜底”,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这一点,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有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具有的基本国情和基本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经过38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sup>①</sup>中国的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而这条道路的最本质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2015)》每篇开头均有导语,从总的方面简要叙述党在各个时期提出的总任务和总路线。而且在各章叙述工业经济各个领域的变革和发展时,也都紧密结合党在这些方面的政策来进行。这绝不是形式主义的做法,绝不是多余的,而是为了真实再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过程。当然,这绝不是说,党和国家提出的任务以及路线和政策,在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都是正确的,都起了积极作用。实际上,在某些时期或某些时期的某些方面是有缺陷和错误的,在不同程度上起了消极作用,甚至还有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左”的错误给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这需要依据各个时期工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给予客观评价。但如果脱离了党的领导作用,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进程是无法得到说明的。这一点,国外对中国工业史有研究的学者也早已看得很清楚。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主编费正清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与帝国时代和民国时代不同,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生活的任何方面,国家的任何地区都不能不受到中央政府使中国革命化的坚定努力的影响。要考察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而不考察共产党变革它的努力的来龙去脉,则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人们就必然要从北京的党的政治局和政府的国务院的角度着手观察中国。”<sup>②</sup>如果把这段文字中的“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换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那么,它的基本精神都是可以同意的。可见,尽管这两位史学家和我们的世界观根本不同,但在研究中国社会生活各方面(当然包括工业经济)时必须研究党和政府的作用这一点上,同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在这种形势下,尽管唱衰中国的议论仍不绝于耳,但在国际上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作用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了。

第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把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任务确定为两个方面:通过新中国工业经济史事的研究和叙述,要着重揭示工业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同时,也要揭示工业生产力的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社会生产都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二者是矛盾的统一体。因此,如果孤立地研究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包括工业在内的社会生产过程都不

①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7-01/18/c\\_1120331545.htm](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7-01/18/c_1120331545.htm),2017年1月17日。

② [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可能得到全面的说明。

这里说的生产关系既包括基本经济制度,也包括作为其表现形式或经济运行机制的经济体制。就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看,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关系范畴的提出,到作为基本经济制度表现形式的经济体制范畴的提出,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第一次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精辟概括。主要包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方面。<sup>①</sup>列宁对此评论说:这是马克思对他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所做的“周密说明”。<sup>②</sup>此后,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和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的毛泽东思想,尽管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历史性发展,但由于时代局限和认识规律<sup>③</sup>制约,除了马克思已经提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之外,他们并没有提出与此相关但又有区别的经济体制范畴。首次提出这一点的,是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首创者的邓小平。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 and 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践为他提出这一点提供了客观基础,而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发 展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又是他提出这一点的根本动因。邓小平依据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实事求是原则,对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实践进行了科学总结,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否定了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就存在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并针对当时国内严重存在否定市场取向改革的“左”的倾向,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个论断就把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同作为发展生产手段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从原则上区分开来。当然,这个论断同时蕴含着这些发展经济手段都是由基本经济制度产生的,后者居于第一位,前者居于第二位,二者不能等同。但他同时强调了市场取向改革的极端重要性。他尖锐指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sup>④</sup>这表明:市场取向改革尽管是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生产的手段,但它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和基本经济制度。这在当时条件下还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可见,邓小平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范畴以外,又增加了一个经济体制范畴,揭示了后者同前者的关系。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这样,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不仅需要叙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生产力的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还要叙述与基本经济制度和生产力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经济体制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否则,包括工业在内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也不可能得到全面说明。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2015)》的撰写力求体现上述思想。其集中表现就是:以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变化作为中国工业经济史分期的主要标准,并以正标题表示;在许多时期以社会生产力的变化状况作为第二位标准,并以副标题表示;在个别时期还以政治因素作为次要标准,也以副标题表示。这样,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的分期就是:

#### (1)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工业经济——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业经济(1949年10月—1952年);

①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页。

③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参见《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141—142、138、96页。

(2)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工业经济——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建立时期的工业经济(1953年—1957年);

(3)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经济(一)——“大跃进”阶段的工业经济(1958年—1960年);

(4)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经济(二)——经济调整阶段的工业经济(1961年—1965年);

(5)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经济(三)——“文化大革命”阶段的工业经济(1966年—1976年9月);

(6)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经济(四)——经济恢复与“洋跃进”阶段的工业经济(1976年10月—1978年);

(7)市场取向改革起步阶段的工业经济——以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战略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工业经济(一)(1979年—1984年);

(8)市场取向改革全面展开阶段的工业经济——以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战略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工业经济(二)(1985年—1992年);

(9)市场取向改革制度初步建立阶段的工业经济——以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战略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工业经济(三)(1993年—2000年);

(10)市场取向改革继续推进阶段的工业经济——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工业经济(四)(2001年—2011年);

(11)市场取向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阶段的工业经济——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工业经济(五)(2012年—2015年)。

但上面分析只是说明了中国工业经济史分期的一般依据,即从总的方面说明了这种划分的首要标准和第二位标准,并未说明各个时期提法的具体根据。这一点正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如果再考虑到各个时期的提法在学术界还有争论,以及个别时期的特殊因素需要进一步说明,那么逐个简要地分析各个时期的提法就显得更为必要了。

依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著作,以及实际经济发展状况,作者将第一、第二个时期确定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sup>①</sup>这是从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来说的。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看,第一个时期是经济恢复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时期。这是很明显的。

我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伴随官僚资本的没收,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和个体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逐步地全面建立起来的。一直到1978年,这种体制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改革,而且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进一步强化。但从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和政治因素来看,这个时期却经历了各有特点的四个阶段,即“大跃进”、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以及经济恢复和“洋跃进”。所以,从前一角度将这个时期划分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一)、(二)、(三)、(四);从后一角度将这个时期划分为“大跃进”、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经济恢复与“洋跃进”四个阶段。

从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即开始步入了市场取向(即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依据改革的进程,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市场取向改革的起步阶段(1979年—1984年)、市场取向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1985年—1992年)、市场取向改革制度初步建立阶段(1993年—2000年)、市场取向改革继续推进阶段

<sup>①</sup> 详见汪海波《“新民主主义论”研究(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经济研究》1993年第12期。

(2001年—2011年)和以市场取向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阶段(2012年—2015年)。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就是要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第一步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解决人民生活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在21世纪中叶使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民过上中等富裕生活。<sup>①</sup>但鉴于1995年比原定计划提前5年实现了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中共中央和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原定的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提高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sup>②</sup>后来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又进一步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部署具体化为两个阶段: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sup>③</sup>在前面(7)至(11)五个时期所作的划分,其依据就在这里。

以上就具体划分11个时期的依据分别做了分析。这里还拟就其中某些时期的起点和终点作一些说明:其一,当前一般说法都把1963年—1965年称作经济调整时期。但是,我国经济调整实际上从1961年就开始了。所以,我们把1961年—1965年称作经济调整时期。其二,市场取向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是以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选择1985年作为这个阶段的起点,是考虑到这个决定实际发生指导作用的起始时间。其三,市场取向改革的制度初步建立阶段,是以199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标志的。选择1993年作为这个阶段的起点,也是考虑到这个决定实际发生指导作用的起始时间。其四,按预定计划,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或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要到2020年才能实现,但本书的叙述只到2015年。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2015)》力图全面反映这期间中国工业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生产力的变化过程,并不只是在于用这三者作为划分历史分期的标准,并以篇的标题示之,还在于它把对三者变化发展的叙述贯穿于全书的始终。《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2015)》在这方面的特点是,不但将其叙述范围限定在工业的范围内,而且从作为部门经济的工业发展史的视角,在叙述生产力、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变化发展时,将重点放在生产力的变化上。但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到位。这是需要今后努力加以弥补的。

**第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就必须遵循坚持实事求是基本原则。**

这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要求。这样,从史实出发,就成为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如果不从史实出发,而从原则出发,就不可能完成它的使命。

但是,这里所说的史实,必须是经过批判地审查过的,去伪存真的,而不是虚实混杂的;是“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而不是“片断的和随便捡出来的”;<sup>④</sup>是反映客观规律要求的大量事实,而不是个别的偶然现象;是表现本质的典型事实,而不是歪曲本质的假象。

总的说来,掌握史料的这四项要求,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是史学研究实现其任务的基本要求,是一项基础性工作。这里仅就第一项要求做些具体分析。已有文字史料大体有两种形态,一是反映历史现象的资料;二是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历史本质的资料。仅就人类认识规律来说,这两种资料都有可能偏离历史真实。问题在于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世界是有差异的,仅此一端就可能造成人的认识偏离客观世界。这是就反映历史现象的资料来说的。如果再考虑到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历史本质的资料就更是这样了。如前所述,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6、251页。

② 《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④ 《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9页。

质,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这样,在一个正确认识过程没有完成之前,人的主观认识脱离客观现实就更难避免了。

如果再考虑到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对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作用,这一点更不可避免。仅就经济制度来说,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般说来,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也存在局部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会左右人们的认识,从而导致主观认识与客观世界的脱离。再考虑到经济体制因素在这方面的作用,问题还会更加严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盲目推行经济高速增长战略,这就必然导致浮夸风盛行。在这种情况下,脱离实际的历史资料必然大量出现。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年代,这一点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诸如在全国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中,各地大放钢铁“高产卫星”的完全失实的报导,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了包括最权威的中央报刊在内的媒体。改革以后,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还未到位的情况下,在经济数据统计方面,“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而且,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以后,虚假资料仍然难以完全避免。市场取向改革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市场经济也有其固有的弊病,其中一个方面就是适应市场交换主体需要的虚假广告。这种弊病也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得到反映。总之,辨别历史资料的真伪是史学研究的长期任务。

需要说明:实现上述掌握历史史料的四项要求,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笔者在撰写《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2015)》的过程中,尽管力求做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做到,要达到这一步,还需要为之终身努力!

还需指出,这里所说的史实,是历史过程中的事实。因此,用历史事实叙述这个过程,是包括工业经济史在内的所有史学著作在叙述形式上所必须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同经济学对问题的分析采取摆脱了具体历史形式的抽象论述,是有重大区别的。

与叙述历史过程的特点相联系,经济史这门学科在篇章排列顺序上也有它的特点。马克思在论述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经济范畴排列次序,以及与此直接相联系的分篇时曾经指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sup>①</sup>与此不同,经济史的研究则必须按照历史发展阶段的先后顺序来分篇。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经济史的研究可以不采用逻辑方法。事实上,经济史对某个历史阶段内各方面经济问题进行叙述时,也有一个诸方面先后次序的排列问题。而这诸方面由于均处于同一个历史阶段,就没有历史发展的先后次序之分;对这诸方面先后次序的安排,就不可能采取历史的方法,而只能依据它们在社会经济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经济史对某个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所提出的各种论点的先后次序的排列,也存在这种情况。但是,经济史在这两方面采用的逻辑方法,与政治经济学仍然不同。后者可以采取抽象的论点形式,而经济史则必须通过历史事实来阐述。就这方面说,史学研究的方法,可以称为以历史方法为主,并与逻辑方法相结合的方法。

依笔者撰写《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2015)》的体会,以历史方法为主并与逻辑方法适当地结合起来,不仅同史学性格是不矛盾的,而且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因为二者不仅都是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所不可或缺的方法,而且是厘清历史发展眉目、便于读者把握历史发展脉络所必需的。因此,如果把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史学研究中可以忽略逻辑方法,这种观点值得斟酌。这样做不仅很难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而且势必使得历史发展的眉目不清,甚至篇章的安排都显得无序。当然,如果不分主次,忽视历史方法的主要地位,把逻辑方法提到不适当的位置,更是不可取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10页。

的。这样就混淆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原则区别。这个问题似乎还是当前我国学界需要进一步探索解决的问题。

#### 第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就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

这是历史唯物论的核心内容。列宁强调:“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sup>①</sup>这表明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基本原理是科学的社会科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根基,是区分真假社会科学的试金石。据此,笔者将这个基本原理称作生产力标准。

邓小平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时期,对于“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极左面目提出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针锋相对地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他还精辟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②</sup>据笔者体会,这里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包括两层相互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的含义。一是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根本生命力来说的,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本质来说的,这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样,生产力标准还是区分真假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尺度之一。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2015)》在评价新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成就和错误、党的路线正确与否、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功过是非时,都是力图依据生产力标准的。

改革以来,在史学研究中贯彻生产力标准的学术生态环境,与改革前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实行“左”的路线的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在这方面仍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当前要贯彻生产力标准,主要是着重批判以否定改革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为特色的历史虚无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但也要注意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辩护改革前发生的某些“左”的错误的倾向。

#### 第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必须注重工业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的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

像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这个过程也有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其发展规律也包括这两方面;而且这两方面是互为条件的。一般说来,事物质的规定性是量的规定性的前提;而量的规定性又是质的规定性的体现。因此,如果只注重质的方面,而忽视量的方面,其发展的历史过程就不可能得到全面的揭示。马克思曾经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sup>③</sup>而且,马克思在他的宏伟著作《资本论》中就在这方面提供了范例。其典型事例就是他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他在自己创立的社会总产品物质构成(即从实物形态上将它区分为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和价值构成(即从价值形态上将它区分为 $c + v + m$ ,即不变资本 + 可变资本 + 剩余价值)两个基本原理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规律[即 $I(v + m) = IIc$ ]和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规律[即 $I(v + m) > IIc$ 和 $II(c + m - m/x) > I(v + m/x)$ ]<sup>④</sup>。这样,他就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完整地揭示了社会资本再生产规律。因此,那种把经济学

① 《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373页。

③ [法]保尔·拉法格:《忆马克思》,保尔·拉法格等著,马集译:《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页。

④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5—446、590页;参见《汪海波文集》第7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3页。

中的数量分析方法看作是西方经济学的独创,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分析远没有达到现阶段信息化迅速发展和大数据广泛运用时代的高度。在这方面,西方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讲话》提出:“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利用,而且应该好好用。”据笔者体会,这里所说的“应该好好用”,包括多方面的内容。诸如,要吸取其有益成份并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防止盲目崇拜、盲目照搬等等。就数量分析来说,当前需要防止经济学研究中已经出现并正在漫延的过度数学化的倾向。这种忽视质的分析,过于注重数量分析的方法,是主次不分,根本达不到揭示历史规律的目的。这也不是学术水平高的标志,恰恰是浅薄的显露。

但就以往经济史的研究来看,数量分析确是一个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2015)》尽管已经注意到要运用数量分析,但也只是开始迈出步伐,主要还是运用了系统的基本统计数据 and 大量的典型数据。这当然也是进行数量分析的一种基本方法,但缺乏经济数量模型分析,总是一大缺陷。在这方面还大有拓展的余地,还需做出艰苦的努力。

**第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就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固有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sup>①</sup>**

《讲话》高度评价了这种精神,强调“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

毫无疑问,这种精神对经济史学的研究也是完全适用的。当然,经济史学研究贯彻这种精神是必须从自身的特点出发的。它不仅应同经济学的研究有区别,而且应同论战性的经济史论文相区别。它主要不是用抽象的理论观点对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背的观点进行批判,而是通过史实的叙述来进行批判。当然,这也不是从绝对的意义上说的。它也不排斥在主要依据叙述史实的基础上,对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扼要分析。但总的说来,在经济史学研究方面贯彻这种精神可以而且必须寓批判于历史的叙述之中。

在这方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2015)》的撰写也进行了一些探索。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党的正确路线占主要地位的时期(如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通过历史过程的叙述,在主要反映其经验和成就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不足。二是在党的错误路线占主要地位的时期(如“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则是通过历史过程叙述,揭示其错误和教训。当然也指出了这些时期取得的成就。但在这里批判精神主要是通过史实的描述来实现的,在这个基础上也对各个时期的成就和问题以及经验和教训进行了画龙点睛的总结。

因此,如果认为史学研究无法贯彻批判精神,是值得斟酌的。当然,如果忽视史学著作与经济学在这方面的区别也不可取。

**第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就必须进行创新。**

《讲话》高度评价了创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

就中国来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一个历时很久的命题。如果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算起,到现在已有近100年的时间。这一点似乎同创新是无关的,甚至是矛盾的。显然,这是一种误解。《讲话》提出,“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

<sup>①</sup> 马克思说过,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与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发主题的创新完全是统一的,前者是后者的根本指导思想,后者是前者的固有品格和强大生命力所在。

但正如《讲话》所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

据此,笔者认为,经济史研究的创新也包含多层次的内容,也是可大可小的。诸如,发掘、校正和编辑整理历史资料是创新,提出一个历史观点,揭示一条历史规律是创新,写成系统的历史著作更是创新。但这一切都是以符合客观历史实际为前提的,以有助于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为目的的。在这些方面,我国历史学者(包括已故的和健在的)已经进行了许多重大创新,取得了重要成果。

笔者在《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2015)》的撰写中也试图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性创新。诸如:在各篇的引言和全文的叙述中突出了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从生产力、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三者相互作用的视角,全面系统叙述了新中国工业经济变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依据反映唯物论要求的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相结合的原则,构建了全书的篇章结构,清晰地再现了新中国工业经济的变化发展过程;以反映历史唯物论要求的生产力标准评价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成就和问题以及经验和教训等等。当然,这些探索远不是成熟的,它是否正确还要留待学界同仁的评论和历史实际的检验。

## Some Issues Concerning How the Research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Follow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Wang Haibo

**Abstract:** Based on long-term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ndustrial economy, this paper takes the example of the book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ndustrial Economy (1949.10 - 2015)* to discuss how the research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can achieve wha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at “Chinese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should continue to follow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Firstly, the research should be guided by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iming to unveil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the laws of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cluding basic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systems which a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ormer or the operating mechanisms of economy) and productive forces. Secondly, the research must follow the principle required by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at “seeking truth purely from facts”. Thirdly, it must adhere to the productivity standards consistent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ourthly,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econom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must be studied and st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quality and quantity. Fifthly, it must reflect the critical thinking and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Marxism. Last but not least, it must be innovative.

**Key Words:** Research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Marxism; Guiding Ideology

(责任编辑:王姣娜)